

编者按:

今天是孙犁先生逝世22周年忌日,本刊特以专版形式刊发《〈铁木前传〉新考》《不负平生识真金》《荷花淀》三篇作品,以示缅怀。南北洋研读大量孙犁作品,从中受到教益和启发,实地走访《津门小集》中提到的白塘口村,有了不同于他人的新发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写作时间、孙犁创作前的思想状态及“铁木二社”的原址等,并提供了翔实而可信的论证,使这部经典作品又有了新的解读。闫庆生先生曾有《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视域中的孙犁》等专著面世,他的这篇悼文,情感真挚动人,写出了孙犁作品对读者的深远影响。杜康的诗歌创作于1992年,30多年过去,从诗歌练习册上抄录下来,仍然清新流畅、质朴情深。

2022年7月,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读到了由宋曙光策划、主编的纪念丛书“我与孙犁”。这套丛书共计五册,包括再准舟的《欣慰的回顾》、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宋曙光的《忆前辈孙犁》,五位著者均与孙犁有过深层交往,是走进孙犁文学世界的新的索引指南。循其路径,我随后又购买了《孙犁文集》《书记文录全集》《孙犁年谱》《孙犁传》等书籍,认真研读,并撰写了多篇文章。

在再准舟《欣慰的回顾》一书中,有专论孙犁《津门小集》的一篇文章:《〈津门小集〉:文学速写的典范》,又在《孙犁:一九六二》《协助孙犁编书的几篇文章》,读到《津门小集》的编辑出版对于孙犁研究的重要性。而在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中,也有专文谈到《孙犁与〈津门小集〉》。孙犁出版于1962年的《津门小集》,全书共两万八千字,被再、谢两位老师如此看重,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在《孙犁文集·书信》卷末,有再准舟撰写的《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我从中查到《津门小集》诸篇目,又在《孙犁文集·散文》卷中找到相关文章,始料未及地开启了一段孙犁作品研讨之旅。

《津门小集》与白塘口

《津门小集》共收入孙犁18篇作品。1962年2月8日,孙犁在致再准舟的信中说:“这些短文,它的写作目的只是在于:在新的生活急剧变革之时,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做及时的‘一唱!’”在后记中又写道:“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做的颂歌,奉献给读者。”可以说,《津门小集》是孙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人民新生活充满欢欣与热情的记录,是一曲“美的颂歌”。

18篇文章中,有进城之初满怀激情写下的《新生的天津》《人民的狂欢》,也有1950年,下工厂写的11篇速写。而《妇女的路》《刘桂兰》《青春的热力》《一天日记》《津沽路上有感》几篇,则是他1955年入冬后,到隶属津东郊区的白塘口乡深入生活、了解合作化运动的农村速写(据政协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文史委编的《辛庄溯源》记载,当时的白塘口乡下辖白塘口、上小汀、唐庄子三个村,乡政府坐落在白塘口村)。这几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从1955年12月10日到1956年1月17日。《孙犁文集》中,在这5篇之后的《积肥与择菜》,文末标注写作时间“1956年1月”,内容是对白塘口村冬季积肥的青年团员的采访,与其他5篇属于同期同地写作,却不在《津门小集》篇目之内。疑惑之下,宋曙光老师帮我联系到当年编辑《津门小集》的再准舟先生,始知因当时没有找到这篇《积肥与择菜》,故未能收入书中。

关于白塘口的几篇速写,人物、事件具体生动,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十一、二位,基本是青年人,女性居多。孙犁在《妇女的路》中写道:“农村的劳动妇女,她们所经历的生活艰辛,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负荷沉重,佝偻以行;她们长夜纺织,机杼、纺车的声音,和星晨共同起落。她们生育时营养不足,老年多咳嗽;她们终生,除去村歌小唱,不能接触更多的文化。”他深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一开始就为农村劳动妇女,打开了通向解放和幸福的大门,铺设了斗争和前进的道路。但是这一条道路,并不是一时轻易地就可以建设成功……小农经济个体经营的弱点和农民生活的贫困,是建设这条道路的障碍。”

怀着对这些与母亲、妻子一样的农村女性深切的同情与爱,孙犁下乡到白塘口,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把视线更多地投向她们,笔墨更多地倾向她们。按作品中的人物年龄,有些可能还会在世,这引发了我的思考:生长在冀中,擅长写

不负平生识真金

悼 阎 琦

西北大学阎琦教授于5月初病故了。业内的学人都知道他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却很少有人晓得他还是一名“孙犁迷”。

阎琦在上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时,曾模仿孙犁的笔调,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柳歌儿》,歌颂农村的新女性,发表在1965年的《西安日报》副刊上。我知道,他入学前就迷恋文学创作,孙犁等写农村题材的几位名家,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入学后,他的作文受到了写作实习课老师的表扬。1981年硕士毕业留校后,他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几十年,但一届一届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都知道他十分喜爱孙犁的作品。

青年时代,他手边不离孙犁的那本《白洋淀记事》,不知翻了多少遍。

“文革”中有一天,西北大学学生三楼一层过厅东墙上,贴出两张小字报。一张是雷抒雁(比阎琦高一年级)写的,另一张是阎琦写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两人的文笔都很好。留校后,阎琦把几十年的光阴,花在了研究李白、韩愈两位大家上。他的文集《识小集》里,除收录了一些研究唐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外,还有一组记人的散文。知人论世是他的特长,其文字的雅洁、空灵,更是引人入胜。这一组散文,都是写中文系几位已经辞世的学者的,其中多是前辈老师,也

农村的孙犁,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生活在天津,写天津乡村的只有《津门小集》里的几篇作品,难得而珍贵。如能实地走访孙犁曾经到过的村庄,或是见到他采访和写过的人,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

我为有这个想法而激动不已。白塘口现归属津南区,我联系到该区的一位文友,询问能否找到孙犁当年到白塘口深入生活的知情人?一听是了解孙犁在家乡的行迹,文友热心相帮,但因时间久远,乡镇建制几经变化,白塘口村早已拆迁,未能找到知情人。不久,偶与津南区女作者李纪莲提起,方知她婆家就是白塘口的,我立即将孙犁文章中涉及的人名等信息传过去。经李纪莲细心电话寻访,终于找到《一天日记》中所写人物林桂兰的亲弟弟林桂起,并约好了相见时间。

寻迹白塘口

我们于2023年9月17日上午,来到津南区辛庄镇,与李纪莲一起去拜访林桂起老人。出发不久,我们便行驶到了津沽公路上,我仿佛看到那些冬日里,孙犁先生在城郊结合部的灰堆下车后,从这里去往白塘口的身影。在这条路上的所见所感触发了他从中国近代史开端到新中国成立、从城市到乡村的深切思考,并写下了《津沽路上有感》:“在这里的农村,邻近这样大的一个城市,无疑的,农民的生活是和都市紧紧联系着。都市曾经给过它哪些东西,或是它曾经以及将要给都市些什么?”他想到清末时帝国主义入侵后,国家民族陷入了深重灾难,想到日寇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津郊人民经历的苦难和反抗斗争。他亲眼看到公路上连绵不断赶往城里的大车,有供应市民的嫩绿白菜,有运往造纸厂的金黄稻草;而奔赴乡村的,有运送化学肥料、新式农具的汽车,赶赴乡下为农民演出的演员和电影放映队等。他“深切地感到以先进的津沽公路本质的变化,彻底理解今天城市和乡村——互助相关的意义了。”

孙犁为时代热潮下的乡村变化而欢欣:“我走进了乡村,乡村正在进行紧张的、愉快的、千家万户的社会主义改造,强烈的、火热的社会主义激情,崇高的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在乡村的胸怀里燃烧起来了。”他还特别写道:“我们还是应该多请那些年老的祖父、祖母、老姑母、老外婆,给我们讲些过去的故事……我们得以过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国家得以在国际上这样坚强有力地站立起来,是走过了多么长远崎岖的路,经过了多少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孙犁进城后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写于进城初期的《吴召儿》《山地回忆》《两天日记》等文章的写作思想一脉相承。一是不忘本的思想,即不忘艰难岁月里,人民竭尽所能给予的支撑、奉献,不忘与人民的血肉深情,共过苦的人民,也应共享胜利果实,更不应该被忘记;二是看到城里曾经的剥削阶级,不事生产却仍享受优渥生活,想到还过着艰苦生活的人民,感情上产生不悦;三是看到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战友,进城后因地位身份等变化而疏离,心理上产生不安。而这一切的根本,是孙犁写作思想与实践上的“人民立场”。

孙犁从小在农村感受民生之艰,“初学为文,意在人生,语言抒发,少年真情,同情苦弱,心忿不平”。他自高小、中学起,阅读进步书籍,由此产生对鲁迅先生一生不变的尊崇热爱,鲁迅的“人民立场”也成为孙犁写作思想的重要根基和遵循。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亲历了与人民建

有英年早逝的同事。特别是他写导师傅庚生先生的那篇,活灵活现,得其神似,气度格局实不一般。陕西师大的几位教授,一度在传看此文。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们经常谈及孙犁。

他父亲阎景翰(笔名侯雁北),任教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其气质、文风,非常接近孙犁,淡泊名利,耕耘不息;为文质朴自然,清新隽永,著小说、散文近20部,人称“陕西文坛的一棵大树”。阎景翰早年为解放军文工团成员,晚年主编《写作艺术大词典》,聘请孙犁为顾问。他曾请书家写了孙犁的名言,挂于书房。他的几位及门弟子都是作家,受他的影响,这几位后辈无一不喜爱孙犁作品,议论孙犁的人品与文品,是他们见面时的一个话题。

阎景翰、阎琦父子俩著作等身,都酷爱孙犁及其作品。此种情况,在全国似不多见。这也表明,“荷花淀派”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西北地区,除贾平凹之外,还大有人在。阎琦先生就曾讲:我们醴泉阎家,与孙犁有缘!此非虚语。想到孙犁大师的作品对我所熟知的文人的沾溉、滋养,我情不自禁地说出心里话:感恩,礼拜,孙犁大师不朽!

阎琦去世一个多月了。他音容宛在,引人哀思。

端午节于西安

立的血肉深情,如《吴召儿》结尾处:“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走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他坚持的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写于进老城新旧交替节点的《新生的天津》《人民的狂欢》,写于1955年城乡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的《津沽路上有感》,都是孙犁自觉奉行并遵循的“人民立场”的体现,这是解读《津门小集》“美的颂歌”的钥匙,也是解读《铁木前传》等作品的钥匙。

很快,我们便在津沽公路边的白塘口小学门口,见到了李纪莲和她丈夫,还有津南区的几位文友。我们来到约见之地时,年已八旬的林桂起出来迎接,他豪爽热情,身后的院子里堆着很多建筑模板、脚手架等,原来他还担任着自己创业的建材租赁家族企业的老板。在场的还有现已82岁,从15岁时就从白塘口村迁居市里的他的表哥等人。林桂起老人带我们来到一片在建住宅楼前,介绍说这是白塘口村的还迁小区,属于白

《铁木前传》新考

——写在孙犁先生逝世22周年

南北洋



塘口地界。往北走不远,是1901年海河裁弯取直前的故道,原来这里有一座小桥,过了桥就是上小汀村。我立刻想到了孙犁在《青春的热力》中写的:“从白塘口村北,走过一架拱腰的小木桥,到上小汀只有半里多路。”孙犁到上小汀,是为采访村里22岁的女青年柴玉英,她为动员说服哥嫂和全家入社,不惜推迟婚期两年,以至男方解约。我想象,随着熟悉情况的带路人到处走动采访的孙犁先生,是怎样以满腔热情走进白塘口一户农家,感受着农业合作化的热潮,为林桂兰、柴玉英等年轻人,留下饱含青春热力的可爱形象,记录了她们果敢向前的行动,也为韩家筋、郑淑琴以及刘桂兰的公公、柴玉英的哥嫂等人,留下主动或被被动汇入合作化大潮的真实记录。

时近中午,我们到附近饭店用餐。看到我带去的《孙犁文集》中有关白塘口的记述,特别是关于姐姐林桂兰的内容,林桂起老人不禁感慨,作家写得准确了。他说,林桂兰后来一直担任村干部,68岁时因病去世。对书中写到的其他人,林桂起等人确认,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因为出嫁、居住分散,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健在。林桂起老人表示,他逐一落实后一定通知我。对《积肥与择菜》中写到的李文太,一位文友说,散步时还见到过呢。他表示找到李文太时会及时与我联系。

白塘口与《铁木前传》

白塘口,是天津市区南面,距海河西岸不远的一个大村,据林桂起老人提供的《辛庄溯源》一书介绍:清末民初,辛庄地区最大、最古老的村庄白塘口,街景热闹繁华,店铺林立……出现过四周邻村及外地人来自白塘口赶大集的热闹场面,从此成就了白塘口的大村地位。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白塘口等十四个村成立了村级政权。1950年,白塘口村的李吉顺带头组织17户农民参加的互助组,是当时天津县第一个互助组(天津县,当时为河北省天津专区天津县,1952年4月21日,划归天津,1953年5月14日撤销天津县行政建制,设立津东、津南、津西、津北四个郊区,1956年1月1日起,分别更名为东郊区、南郊区、西郊区、北郊区,白塘口时属东郊区)。1951年,白塘口村在李吉顺倡导下,把互助组及合作组归并在一起,成立了由84户贫雇农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也是天津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辛庄地区各村农业生产合

每个在中学河流中练习游泳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长满荷花的水泊五十多年前,一个名叫孙犁的年轻人曾在沁人的荷香深处当过一年孩子王

但战争爆发了。这个名叫孙犁的年轻人,毅然抛下隔夜粮,扎上绑腿,加入一支放下锄头、扛起猎枪的队伍,奔赴黄沙遍地的圣地

那时,中国的圣地名唤延安耸立的宝塔与含沙量很高的那条河流至今,名气依然很大让我们每个人都心驰神往

作社已经普及,共建立了34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和一个集体农庄。1956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辛庄地区全部建立了一乡一社式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白塘口村、上小汀村、唐庄子村组成的白塘口乡,建立了金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白塘口村带头人李吉顺任社长。他出生于河北青县贫苦农家,解放前逃荒要饭来到白塘口,以扛活苦力为生,新中国成立后以极大热情积极工作,1951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是合作化高潮时期涌现的知名度很高的先进人物,1956年1月12日,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白塘口在李吉顺带领下,始终走在农业合作化前列,在天津知名度很高,这也是孙犁到白塘口采访的原因吧。

在与林桂起等人见面之前,我收到津南区一位文友寄来的准备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校订本,其中讲述白塘口村木匠传人田树豹的一篇中,其父田景云在上世纪50年代,加入村里铁木二社的情节引起我的关注。按文中内容推断,田景云加入铁木二社的时间应该是在1955年,这与林桂起等人介绍的铁木二社建立时间基本相符。他们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确实有铁木二社,建立时间或在1955年之前,但一时又说不上。据林桂起同村的李华成老人说,铁木二社曾迁址到他家不远处,他到铁木二社院里去收人家不要的刨花,拿回家烧火,院子里有铁工、木工和铁匠炉。约在1958年,铁木二社迁往海河东边的小东庄。

与林桂起等人见面后的第四天上午,津南区文友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些天,他们一直开车在路上转,终于遇到李文太老先生,让我前去会面。因我当时有事一时过不去,便在我电话里对李文太做了采访:李文太出生于1940年,他对孙犁采访青年团员积肥的事迹,还有清晰印象。李文太说,白塘口村的铁木二社是在1954年成立的,他那时放学后总去铁木二社的工厂玩,来自津南小站的一个铁匠,还与邻居张家的姑娘结了婚。

为进一步确认铁木二社成立时间,林桂起老人又找到白塘口年纪更大的一些老人了解情况并做了记录。我们再次来到白塘口,除上次见到的林桂起、李相清、李华成三位之外,还有82岁的李海津老人。据林桂起了解记录及李海津讲述,铁木二社成立于1954年,用的是村里官称杨四爷的地主家的旧宅。杨四爷家的房屋很多,铁木二社最初建在他家交给村里使用的房院,前院铁工、后院木工。1956年扩大后,迁到村东的新址,1958年再迁往小东庄。

据此,1955年入冬后,孙犁到白塘口深入生活时,白塘口村已有铁木二社,且发展良好。孙犁来到白塘口乡,先去坐落于白塘口村的乡政府听取情况介绍,再由熟悉情况的人带着前去采访,铁木二社无疑是会进入孙犁耳中、眼里的存在,白塘口村洋溢着的进步的喜悦和热情,自然给了作家丰富的感受与创作的灵感。孙犁看到为之奋斗过的理想,正在这里蓬勃生长为美好现实,这里的人民正焕发出足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热忱和力量。进城后,他内心深处产生的不平、不安的感觉,突然找到了书写的载体;铁木之配合,如朋友互助,如战友无间,如城乡共荣;铁木之离殇,如朋友背弃,如战友疏离,如城乡发展之不平衡。还有比铁木之间的关系,更好表达这些难以言表的苦恼情绪的吗?

孙犁在给阎纲的《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如此。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苦恼。”《铁木前传》中,木匠黎老东生活好转后,做起发财致富梦,置了宅子,并背弃约定,使年老多病的女房主不得不离家,他提前入住;黎老东穿上温暖讲究的皮袄,袖手监工衣衫单薄破旧的患难朋友、铁匠傅老刚为自己打大车;穷苦时,为儿子六儿向铁匠提亲,如今孩子们都已长大,日子好了的他却不再提儿女婚事,羡慕黎七儿赶大车做买卖发财,寒冬里让傅老刚赶制大车,完工后却不给工钱……

铁匠和木匠关系变化的情节设计,正是孙犁进城后思想感情的体现:“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在白塘口听见的“铁木二社”,应该是让孙犁脑中灵光闪现的直接催化剂。“小说进一步明确主题,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孙犁明确说《铁木前传》不是1953年安国下乡的产物,而从安国下乡后的5篇速写看,一是从时间和内容上距合作化运动还比较远,二是《铁木前传》结尾的“但是,你的

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你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你正在满怀有信心地,负载着千斤的重量,奔赴万里的征途!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你希望的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这充满激情的、激励人心的一段,在安国下乡的诸篇速写中,找不到生发的感觉和氛围,而白塘口采访后的几篇速写里,那处处洋溢着的“青春的火力”,恰是产生《铁木前传》这种感情抒发的动因。

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中有关《耕堂聊天记》,1985年10月3日那天的记录载:“孙犁说《铁木前传》本来是要在(19)55年写的,后来一反胡风,写不下去了,拖到了(19)56年。”(1955年反胡风,批丁、陈,12月,孙犁到北京参加批丁、陈,但也许因对丁玲的敬重,与谢大光聊天时未提丁玲)。从时间上看,1955年入冬后的白塘口采访见闻,特别是铁木二社的存在,与后来的《铁木前传》写作,显然更符合水到渠成的创作规律。

孙犁在1956年1月,完成下乡采访任务,开始写作《铁木前传》,当1956年3月29日即将完稿时,却因过劳晕厥而突然摔倒,磕破面部,治疗时暂停写作,外出疗养。5月21日,孙犁回到天津,暂时封锁回津消息,闭门完成《铁木前传》的末章,正是小说结尾标注的“1956年初夏”。他在1956年5月31日给王林的信中说:“回来以后,对外封锁消息数日,盖因修改《铁木全传》颇为紧张……回来以后,突击五日,初稿完成,已交允之同志审阅。其实没有多少字,只三万五千字,我前和你谈‘十万计划’,只能待后努力了。”1956年9月26日,又在给田间的信中说:“我这一年在半病中度过……只写了半部小说,其名《铁木前传》,十一月份,你大概可以看到。”据以上信件内容看,孙犁起初给小说起名《铁木全传》,并有“十万计划”的写作雄心。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匆匆结束,小说名也改成了《铁木前传》,并以此名在1956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一部内涵深邃、解读不尽的优秀作品就此诞生。1957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铁木前传》单行本。

富于美和诗意地写农村的“孙犁风格”,农业合作化的故事背景,精彩的叙述和结构、人物、情节设计,让喜爱《铁木前传》的读者如饮醇醪。但《铁木前传》与当时主导性的文艺创作思想对照显得“非主流”,致使围绕作品的争议,甚至批判不断——尽管批判者往往不得要领,如“负面人物比正面人物还多”的指摘,对作者创作倾向的诟病等。实际上,含蓄是孙犁写作的重要特点,作者的倾向从不经意处细心阅读即可体察。如对被小满儿讽刺脸黑的九儿,作者这样描述:“九儿长高了……她的脸蛋儿很是干瘦,头发上挂满尘土,鞋面已经飞裂,只有那一对大眼睛里射出的纯洁亲热的光芒,使人看出她对于回到这里来,是感到多么迫切和愉快。”“九儿上到滑车上,用力攀登着……四儿从井底望着她,一时感到这是一个奇异的动人的少女图像。”字里行间,能读出作者对傅老刚、四儿、九儿、锅灶等人的感情,他们不断学习进步,改变落后生产条件,积极走合作化道路,作者对他们肯定、赞赏;黎老东的生活陋习、情义日薄,黎大傻夫妻的好吃懒做,特别是丑陋凶悍的婆娘,白天走东串西,晚上家里人多得“挤倒屋子压塌炕”的混乱,六儿、杨卯儿的不务正业,黎七儿的生财有道和对吃香喝辣的生活追求,代表了“嫌贫爱富”和“吃喝玩乐”的不良诱惑。与傅老刚刚掰后的黎老东,见到回来的六儿,“在儿子的身上脸上,只能看见一层不成材的灰败气象”,作者的倾向在笔下表露无遗。

对很多人都认为是写女人美到极致的小满儿,作者写作时的感情应是复杂的。在上述“吃喝玩乐”的诱惑之外,小满儿是“色”的诱惑象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贪腐大案,就发生在天津,特别是张子善在女色堆里的腐化,印证了孙犁进城后的感受和担忧,也是面临同样诱惑的人们需戒惕的。对于美的热爱和欣赏,是人的天性,希望小满儿这样美而动人的年轻女性,向着好的方向转变,也是作家的良好愿望。

小满儿的原型,有孙犁1953年在安国长仕村下乡时,房东儿媳满花的影子,但在借用满花俊俏的外貌之外,主要是借用她姐姐、姐夫的原型,塑造小满儿的姐姐、姐夫黎大傻夫妻。在安国速写的《齐满花》中,满花姐姐的丑陋,两口子好吃懒做、卖什么吃什么的情形,在《铁木前传》小满儿的姐姐、姐夫身上充分体现,小满儿身上的不安分,作为有夫之妇和六儿的鬼混纠缠,则有孙犁在《乡里旧闻》中,写童年时代“木匠的女儿”小杏的影子。

在《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孙犁说:“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即使一个短篇,也很难说就是写的一时一地……它是通过创作,表现了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的爱憎。”《铁木前传》是在孙犁进城后思想感情长期酝酿之下,在白塘口合作化热潮激荡下,由铁木二社引发灵感后创作出的不朽杰作。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文艺周刊

第二九八三期

荷花淀

杜康



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硝烟,熏黑了那个名叫孙犁的年轻人的清瘦脸颊他俯身窑洞昏暗的油灯下在清脆的塔铃和悠长的水声里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满怀对离别八年的母亲、妻子和故乡思念

用浓淡不一的笔墨为那个在月光下编织苇席的女人和名唤水生、举枪瞄准的年轻后生塑起了一座热爱和平的雕像

如今,名叫孙犁的那个年轻人老了今天我们恭敬地称他为先生先生在津城寓所深居简出如扎根白洋淀的老藕,以岁月为节撑起碧绿的荷叶,绽放迷人的荷香

而我陆续成长的弟弟妹妹置身温暖的阳光下用青蛙般干净的声音诵读先生多年前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开创出一个文学流派的清新文章